

傳記文學叢刊

日本侵略華北史述

梁敬鈞著



日本侵略華北史述

梁敬錚著



傳記文學叢刊八十四（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日本侵略華北史述

定價新臺幣一百五十元

著作者：梁敬鍾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 1-36 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 0003691-0 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廿日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

前 言

梁敬鑄（和鈞）先生為當代大史學家，其重要著作正式出版者計有「辛亥革命」、「開羅會議」、「九一八事變史述」、「史迪威事件」（以上四種俱有英文版）及「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註」、「中美關係論文集」等書。

梁先生近二十年來為「傳記文學」雜誌所撰論文百餘篇，除與上述各書有關者已分別收入各該書外，其餘主要為討論中美問題與中日問題之作。前者在其逝世前不久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輯為「中美關係論文集」一書出版。關於中日問題，梁先生原意係繼其「九一八事變史述」作一係列之研究，後以研究中美關係而擱置。現梁先生逝矣，本社為紀念這一位長期為「傳記文學」撰稿的學者，特將其在「傳記文學」發表而尚未輯印成書者，加以整理編輯，遵照梁先生遺意，題為「日本侵略華北史述」，其中與日本侵華無關者，統編入附錄，以存史料，並誌追思，幸讀者垂察焉。

傳記文學出版社謹識

日本侵略華北史述 目錄

前 言

日本侵略華北史述

——自山海關至蘆溝橋

第一章 引 言

第二章 一九三三年之侵略與壓逼

第一節 山海關之佔奪

第二節 热河之佔據

第三節 長城作戰與灤東進出

第四節 停戰接洽之開始與僵持

第五節 停戰僵局之打破與塘沽協定之成立

所謂何梅協定

一、緒言

二、協定交涉之發生

三、協定交涉之經過

四、協定交涉之一度國際化

五、何應欽函件之經緯

六、日方提出交涉之內情

五一 五四 四九 四九 三九 三九 三七 三七 一九 一九 六四 四一 一一

七、結語

五七

日人岡田有關「何梅協定」的一封信

六五

秦土協定

六九

一、秦土協定

七九

二、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之反應

八九

廣田三原則

八九

第一節 三原則之緣起

八九

第二節 三原則案製成之經過

九二

第三節 三原則案之初步交涉

九六

華北自治運動

一〇三

第一節 自治運動之由來

一〇三

第二節 自治運動之導演

一〇四

第三節 自治運動之激化

一〇七

第四節 自治運動之挫折

一一一

一、南京備戰與東京顧慮

一一一

二、外交部署與有吉會談

一二一

三、冀東傀儡組織之出現與反抗

一五

第五節 自治運動之變質

一七

第六節 自治運動之反應

一九

日本大陸政策的成長與變質

一三七

記偽滿「康德皇帝」

一四三

九一八事變的内幕

一五五

中國東北宜爲「日俄緩衝國」之謬議

一五九

——一九四二年居里與蔣委員長談話披露

一五九

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

一六三

一、點火工作的經過

一六三

二、保釋工作的經過

一六六

三、外交秘辛之參與

一六八

五四運動之回憶

一七五

——民國七十一年北大同學會五四紀念會講詞

一七五

「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讀後感

一七九

——「戰時中國研討會」之緣起與辯論經過

一七九

附錄：

單車衝圍記

一八五

林長民先生傳

一九四

林宗孟與郭松齡

二〇九

敬悼孔庸之先生

二一三

林白水先生傳略補遺

二一六

胡適之與董行嚴

二一九

程櫟秋先生的生平	二二六
君勸先生二三事	二二九
序薛光前著「故人與往事」	二三二
敬悼薛光前先生	二三四
沈著「徐世昌評傳」序	二三八
梁敬釗先生行述	二四〇
「闖一多是如何成爲『民主鬥士』的？」的回聲	二四二
「孫逸仙先生傳」跋	二四三
不能以歲時限之	二四五
——傳記文學創刊二十週年紀念冊序	二四五
梁敬鑛小傳	二四五
梁敬鑛先生專著暨論文目錄	二五五
	二五六
	二五六
	二五六

日本侵略華北史述

——自山海關至蘆溝橋

第一章 引 言

自九一八事變至七七抗戰凡六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此六年中，日本狃於滿蒙分離工作之成就，進爲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割裂之企圖，一九三三年山海關佔奪之役（一月），熱河佔據之役（三月），長城各口戰事之役（三四兩月），塘沽協定之役（五月），一九三四年，關內外通車、通關、通郵各事件（五月至十二月），天羽聲明事件（四月），一九三五年察東事件（一月），何梅協定（六月），秦土協定（六月），香河自治運動（七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建立（十一月），冀察兩省特殊化事件（十二月），以及一九三六年綏東百靈廟戰事之役（十二月），其分化之手段雖不同，而割裂之目的則一貫。卒至中國被迫抗戰，爆蘆溝橋之火花，掀太平洋之濤浪；七載鏖兵，牽及世戰，日本幾至不國！重光葵外相〔註一〕爲東京灣密蘇里兵艦上代表日政府簽定降書之一人，當其被判戰犯，收禁東京巢鴟監獄期中（一九五〇年二月），追傷往事，對於日本軍閥窮兵黷武，得翫望蜀之舉措，深致慨歎，其言曰：

如果滿洲事件（九一八事變）只做到育成滿洲國爲止；我想這件事不難得到國際上之解決。……如果日本政府能將事變範圍，限在中國長城以外，則滿洲問題，中國問題，當亦不難在壇坫上得到結果；無如行險僥倖之範圍，伸入華北；中日間之火花爆起，日本之災難，即見降臨！〔註二〕

重光此言，隱爲露關辯護，雖非無據；但吾人今檢日本當年內閣議案，參謀本部關係課紀錄暨其他國際可靠資

料，足證九一八事變以後，蘆溝橋抗戰以前，所有對華重要政策，皆曾經過閱議，至少亦曾經過外陸海三省主管當局之同意。例如一九三二年之滿蒙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曾經過大養毅內閣三月十二日之決議〔註三〕，一九三二年之時局處理方針（別紙甲號，對支案），曾經齊藤實內閣八月廿七日之決議〔註四〕，一九三三年之帝國外交方針，曾經五相會議（首相，及外財陸海四相）十月二十一日之會訂〔註五〕，一九三四年之對支政策文件，曾經陸海外三省主管課長十二月七日之同意〔註六〕，一九三五年之廣田三原則，則於外陸海三省主管課一再會商修正通過之後，復經三省大臣十月四日共同之了解〔註七〕，一九三六年之帝國外交方針與其對支實行策，則亦經過八月七日及十一日五相會議先後兩次之議決〔註八〕。凡此資料，悉見典冊；震關當局，似不能全卸咎責，大抵當年震關與三宅坂之間，對於侵華方略，只有時機早晚或手段寬猛之出入，而無政策是非之基本爭執。大養毅時代，日本對華侵略之野心，尚僅限於滿蒙一隅；齋藤，岡田以降，則「分治中國」，「北守南進」以及不惜與英美一戰之決意，逐漸形成〔註九〕。一九三六年，成都，北海，日人被害事件突生時，日本海軍軍令部之主戰態度，比之陸軍，尤為激烈〔註一〇〕。故謂海軍將校持論比陸軍穩慎，亦非完全正確。

日本之侵略吾國也，標其名，曰大陸政策之遂行〔註一一〕。大陸政策之受害國家，直接為中國，蘇聯次之，英美又次之，日本欲求該政策之遂行，勢不得不對中蘇英美，作同時作戰之準備，然此非日本國力所及，且與明治以來「國防方針，避免與兩個以上強國，同時作戰」之基本戰略相背〔註一二〕。於是東京文武，遂有兩派之意見：文派以為日本既得滿洲，則宜先以全力開發茲土，同時並宜以善鄰政策，向中國釋宿怨，與蘇聯戒衝突，與英國謀英日同盟之復活，與美國謀東方門羅主義之承認；而後日本大陸政策之收穫，始能維護於永久。武派以為開發滿洲，須有充足經濟資源，而此經濟資源，則在華北五省〔註一三〕。武力奪取華北，勢將引起國際戰爭，固宜力避，但中國政局久在紛亂，北方軍隊，號令不一，對蔣各有貳心，若日本乘席捲東北之威，臨華北以壓境之兵力，更佐以反間之謀略，則華北之瓦解，正不必經過真正之戰爭。持此說者，多為當年東京參陸部省之「中國通」，而功名心重之少壯軍人，與陰謀技癢之浪人志士，亦咸願負弩前驅。此輩議論，初在廟堂，未占勢力，但經遼吉黑之豪奪

，錦州之巧取，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之虛聲恫嚇，種種試驗之後，武派「不戰而得」之推斷，既證明為正確；則文派「引起禍害」之警戒，遂轉目為迂濶，加以其時法西斯思想之風行，大日本主義之高唱，以及日德防共協定之成立，整個日本國是，乃如盲人瞎馬，夜半深池，而不能自制。湯恩比先生嘗言：「無人能燬日本，燬日本者，必是日本自己；日本軍人的行徑，正是一個全民族切腹的行為！」此論發在一九三三年，惜乎日本之不早悟也！（註一四）

其實一九三五—三六年之間，日本國際孤立之危機，已甚顯著。美國之重整海軍（註一五），英國之趕築新嘉坡軍港，其目的皆在對日。英日間棉織品市場之競爭，更已至短兵相接之地步（註一六）。即中蘇國力，亦遠非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之間所可比擬，蘇聯自九一八事變之後，遠結歐美各國之奧援（註一七），近擴遠東軍區之兵防（註一八），由國際孤立，轉為得道多助，與日本正相反。一九三四年之後，日本已無戰勝蘇聯之可能（註一九）。中國自失東北四省之後，採安內而後攘外之政策，壹意剿共，建軍，趕築內線鐵路，軍用公路，施行法幣政策，提倡新生活及經濟建設運動（註二〇），於推行中央政令中，寓有收取川、陝、雲、貴、廣西、西康為抗日大後方之準備。一九三六年，西南執行部撤廢（註二一）。兩粵歸順中央之後，統一之機運已熟，全國之領袖已出，日本對華，亦即無速戰速決之可能。嚮使此際日本文治派之主張，猶足影響其政府之政策，則蔣委員長「敵乎友乎」之剴切宣示，應可促起日人之反省（註二二），不幸二二六東京兵變之後，歷屆之日內閣，均完全為軍人所控制，而冀察特殊化之壓逼，又變本加厲，遂至激起中國全國青年之反抗，坐令國際共產黨克售其統一陣線之戰術。蓋此際中日危局，已如渴驥奔泉，輕舟下峽，莫之能挽。夫中日戰火，不燃於日本「對華優越感」極度凌人之一九三五年（註二三），而發於日本「對華再認識論」正加反省之一九三七年（註二四），誠為三十年代中，遠東之大悲劇。今日史事重檢，倘起坂垣、土肥原、酒井隆等於地下而問之，恐其悔恨，當猶在重光葵之上。是如秉理國鈞，應賴老成，効忠王室，終需遠識。一二急功之見，立威之論，以及陰謀之詭奇，雖未必不能得意於一時，而究其極，將終貽國家以百年之大患。可不戒哉！

第二章 一九三三年之侵略與壓逼

本期日本對我侵逼，包括山海關佔奪，熱河佔據，長城作戰，灤東進出，及塘沽協定訂立各階段，起於一九三三年元旦，結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末日。山海關啓辟，歷史上具有消極的與積極的兩層意義；就積極意義言，此為侵略中國本部之序幕戰。但有一點應予明白指出者，榆關佔奪，長城各口攻擊，以及灤東進出，塘沽協定苟勤等事，皆非東京政府所發動，發動原力，或出自在華低級佐官，或出諸前方軍幕，或出諸駐華武官，若輩逞其一隅之見解，出以獨斷之陰謀，造出既成之事實，以觸動日本憲法特制之統帥權，藉使對華施政之輔弼權責，由內閣轉入軍部之手（註二五）；而軍部則心喜之，彌縫之，且進而合法化之，往復勾串；內售其冠上之術，外迫我城下之盟，迹其所為，與九一八事變時關東軍幕僚之陰謀無異（註二六）。蓋皆日本當時政治上軍事上最機密之醜態也。今請自山海關啓辟敍起。

第一節 山海關之佔奪

山海關戰事，雖起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但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十二月八日，已先有小規模之兩次衝突（註二七）。十月一日之衝突，尚僅為我駐榆何柱國旅團與偽滿警察隊之接觸，十二月八日之衝突，則日本第六師團裝甲部隊直接參加。是役我方當地駐軍，被逼道歉賠償，戰火雖告暫戢，而日方輕侮之心益熾（註二八）。當時東京軍部，只有佔取熱河之計劃，而無攻佔山海關之方案，而山海關日本駐軍，按照辛丑和約分配，只許三百人（註二九）；設非預得關東軍之支援，自無由孤行其對華之侵略。佔取熱河計劃，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已由內閣制定（註三〇），但因大義毅首相，尙懷縮小事變之願望，及國聯調查團來華調查之影響，遲至一九三二年八月，猶未付諸實施。參謀本部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及八月，雖曾將弘前第八師團，熊本第六師團，先後調滿，予以攻熱之內命，但內閣因國聯十九國委員會，正在日內瓦討論調查團報告書，深恐攻熱事起，將使國聯態度，對日硬化，遲遲

不決。駐榆日本鐵路守備隊隊長落合（甚太郎）少佐，既憤東京政府之瞞跚，又逆知關東軍躍躍欲動之內情，乃步柳條溝炸車造變故智，於一月一日晚，自令憲兵，在其司令部門前，及附近地方，分投炸彈數響（註三一），指係我方駐軍所爲，要求我軍撤退關門防衛，我方拒絕，戰事遂開。此段內情，久被日方隱諱，今從日本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山海關事件」之記載，參以顏惠慶代表在國聯特別大會上之報告，與當時路透電及密勒氏評論報之報導，述其真相如左：

一月一日夜十時，山海關日本鐵道守備隊門前，發生炸彈，及槍聲。中國駐榆何柱國第七旅石世安團，派陳某向日軍司令部探問，日方要求調查，並將關垣內居民悉數遷出，限五十分鐘答覆。是夜十二時又提出要求四項：

(1) 山海關南門，應由日軍把守，(2) 中國南門衛兵，應即撤退，(3) 警察隊亦應撤退，(4) 中國駐榆旅隊，亦應撤退。何柱國旅長，時在北平，聞訊趕回，未至，日軍即於翌晨（二日）八時，其兵車到達後，對我攻擊，日本飛機，並在關內投彈，中國軍隊還擊。日軍死三人。三日，上午，日本第八師團八個中隊連同守備隊二中隊，飛機一中隊，及秦皇島開到之軍艦「平戶」號，以海陸空三面力量，夾攻山海關，午後三時，山海關陷落！（註三二）

是役，我何旅石團之安德馨營長，及全營三百人，全數殉職，中國方面，死者五八四人，傷者四九〇人（註三三），何旅撤退中，亦另有損失，即在石河，構築防守陣地。

中國於一月三日，將此事變提訴國聯（註三四），國聯對日，雖表不滿，但無切實辦法，英國以日軍勢力侵入華北，將妨及開灤煤礦與北寧路之英國利益，態度轉硬，故此一役，與其後國聯十九國委員會對日一致譴責之決議有關（二月廿四日決議）。然國聯既乏制裁侵略之實際行動，南京政府亦不能支持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三代表出兵收復山海關之請求（註三五），此事件遂亦一如錦州失守之空言抗議而已！而落合少佐之大膽果斷行動，則轉受到第八師團之褒許（註三六）。

第二節 热河之佔據

熱河南界河北，西接察哈爾，東北與遼寧省爲鄰，位於北緯四十一度至四十六度，東經一一六度至一二二度之間，有地七萬四千二百九十七方英里，人口二百三十萬，其地本爲內蒙古昭烏達盟與卓索圖盟之牧場，改省後，於一九二九年劃入東北，稱東四省，由張學良推薦湯玉麟主軍政。日本自製造滿洲國後，久以熱河爲滿洲國之領域，滿洲國成立宣言中，已將熱河列爲國土之一部分；國聯調查團經過滿洲時，偽滿當局，已向其聲明：滿洲國國境，係以萬里長城爲界（註三七）！故日軍謀佔熱河，早爲舉世周知之事實。關東軍司令官與其參謀長於一九三二年七月間，曾兩次電請東京增派步兵一師團、騎兵一旅團，爲侵熱之用，東京參謀本部，皆以情勢尚未許可駁覆（註三八）。八月得諜報：張學良已將正規軍四萬人編爲義勇隊派往熱河助防，參謀本部乃調熊本第六師團來滿，充實攻熱兵力，但山海關開戰後，參謀部尙以攻熱時機未到，曾派其總務部長梅津（美治郎）少將，赴滿說服，而關東軍曹執意甚堅，軍部竟至屈從（註三九），武藤司令官於一月廿七、廿八、廿九，連發攻熱命令三通，說明對熱作戰方針，嚴戒侵犯河北省，其言曰：

本軍前令曾有除別予明令外，作戰行動，不得侵入河北一語，今欲再加說明：

熱河爲滿洲國之領域，在此領域內，本軍行動，尙可自由，但隔一長城之河北，則係中華民國之領土，在該領土上，本軍無行動之自由，在事官兵，如眩於局部之情勢，或欲動於戰術之必要，而有越界行動，則係違反國策，貽誤大局，煩及大元帥陛下之軫念；誠不勝其恐懼！其各嚴飭所屬，切實遵守。（註四〇）

照此軍令，可知關東軍攻熱，最初原無侵犯長城以南之意向，齋藤首相一月十五葉山觀見日皇後之聲明，陸軍當局一月十一日對於路透電社之談話，以及松岡洋右在國聯十九國委員會上之報告，皆有熱河戰事絕不擴至滿洲國外之表示。蓋當時日方所持理論，謂攻熱之事，乃係援滿，而非侵華也。

日本其時調往東北三省之兵力，雖有五師團十混成旅之多（註四一），而除警戒南北滿及蒙邊外，用以攻熱者，

，實不足兩萬人（「太平洋戰爭之路」⁽³⁾，頁十九，參考），其中以第六、第八兩師團爲主幹。進兵分三路：北由

通遼向開魯，十四師團當之，中由義縣向朝陽，第八師團當之，南由綏中向凌源，第六師團當之，以第十師團爲預備隊。

湯玉麟本係東北軍閥，其治熱期間，惟以販賣煙土，敲扣軍餉是務。防熱兵力號稱八萬（湯部三萬、馮占海二萬、萬福麟三萬），但可用之兵除于兆麟、穆徵流、沈克，總約兩萬人外，其餘皆無戰鬥力，玉麟自九一八事變後，即持首鼠兩端態度，嘗派代表參加滿洲國建國會議，又與張學良通聲氣。其部下崔興武董福亭兩旅，早密向日方輸誠（註四二），玉麟則使興武當開魯前線，福亭當朝陽中路，二月廿三，日軍總攻擊令下；董福亭不戰而叛，崔興武守一日而退，日軍廿三克北票，廿四取開魯，廿五得朝陽，廿六抵下窪子，于兆麟戰死凌源，孫殿英敗退多倫，日軍三路，鼓行而西，三月一日克凌南，二日奪凌源，三日取赤峯平原。玉麟佯稱前線督戰，實則徵集卡車，滿載煙土，逃出省垣。日方川原（第十六混成旅）挺身隊，乃能以一百廿八人之兵力，輕取承德（註四三）！七萬四千二百餘方英里之江山，七日之間，淪於敵手，平津震動。宋子文時代理行政院長，二月中旬，嘗偕張學良赴熱視師，歸後，聯名通電，內有「含犧牲無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之警句，而未及一週，熱河即垂手失去，士論尤譁（註四四）。

熱河處建瓴華北之勢，欲保平津，即不能不守熱河。丁文江氏早有建議，其「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載在「獨立評論」，略謂：

天津在灤河北面，秦皇島在山海關後方，日本如在灤河或秦皇島登陸，比松滬戰役中，在瀏河上岸，更覺容易。不守熱河，即不守平津。張學良應將司令部移往張家口，車輛物資，移到居庸關，熱邊部隊應該進到朝陽。凌源、平泉、朝陽、承德的運輸，應該注意。

熱河東南是山地；日軍不能用坦克和重砲，就連飛機也有危險。喜峯口、古北口，每處有一兩萬大軍，就可守得住。只要當局有守熱的決心。（註四五）

丁氏此文，寫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距熱河失守，約七個月；一個月後，他見熱河佈防失當，又作一文，再

致警告。他說：

熱河部隊，只有四步兵旅，六騎兵旅，合計不過二萬枝槍，……朝陽北票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槍，日本如

在錦縣義縣進兵，該地防軍，就沒有抵抗的能力！

如果我們趁日本人沒有決心進展的時候，先遣四五萬兵到熱河，利用東南山地，預先佈置防禦工事，日兵決不能輕易入熱。我們現在將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兩省，而將熱河交給湯玉麟去防守，這是什麼戰略？我不懂

！

此文發表於「獨立評論」十九號，其日期爲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五，距熱河失守，亦尚有半年。所指缺點，所料敵情，厥後皆驗；當時中央與東北當局，似對此建議，都未置意。據日方資料，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五日，蔣張在南京有一軍事秘密會議；張請蔣北上指揮，蔣因江西剿匪，不能分身，派陸大校長楊杰，率幕僚二十餘人北上，襄助張氏，佈置軍事。其後關麟徵之二十五師，黃杰之第二師，相繼北調，皆此時所決定（註四六）。但關黃防務，在古北口，與熱河作戰無干；故熱河失守，北方輿論，以人事未盡，除痛責張學良外，亦連南京軍事當局（註四七）；蔣廷黻謂熱河失守，國人精神上所受之打擊，有過於九一八，並非虛語（註四八）。

熱河失守，關係南北政局，均極重大。蓋是年一月，故宮古物南遷；二月，外交檔案南移；二月，段祺瑞自津南下，皆予北方人心以刺激。而山海關戰事起時，江西第四次剿共軍事，亦正失利，蛟湖霍源諸戰役，國軍主力三師均被擊破（註四九），西南政委會既以錦熱迭次失守責中央，上海廢止內戰同盟，民權保障同盟，又對於安內攘外國策持異議（註五〇）。汪精衛氏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因與張學良不睦，負氣出國，行政院長，虛席至今，榆熱戰事失利後，國內詬諱執政黨，要求還政於民之呼聲，更大熾烈。蔣委員長於熱河失守之第四日（三、七），特自江西剿匪前方，抽空北上，召閻錫山於石家莊，召張學良韓復榘於保定，促汪精衛回國復職，准張學良辭職出洋，令何應欽兼任北平軍分會委員長，節制北方諸軍。於是徐庭瑤、關麟徵、黃杰之中央軍，駐密雲，守古北口；宋哲元、劉汝明、趙登禹之西北軍，援喜峯口，守羅文峪；王以哲、何杜國、萬福麟之東北軍，分守灤東、冷口、界嶺

口。部署初定，江西共軍，復出擾贛江，蔣氏匆匆返贛督剿，汪精衛三月廿九復職，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政策，當外交之衝，而灤河東西與長城各口之戰鬪，亦日見激烈。

第三節 長城作戰與灤東進出

關東軍總攻熱河之日（二月廿三），即日內瓦國聯特別大會全體譴責日本之時（二月廿四）。如果日本攻熱目的，只在確定滿洲國之國界，則佔據承德之後，宜可解甲息兵，不事擴大，然東京軍部固不以此爲已足也（註五一）。於是長城各口之侵略，與灤河東西之進出生焉。兩處戰事，與熱河作戰不同。熱河作戰，一純武力之侵略而已；長城與灤東進出之戰事，則武力之外，更雜陰謀，而陰謀之期待，實尚在武力之上。陰謀內容，在策動華北之內變，東京軍部所以重視陰謀者，似有三因：1.平津地方，爲國際所注目，在十九國一致譴責之後，日本如對平津，再作侵略，國際干涉，不能不顧慮；2.佔取平津，必須更大兵力，而當時調滿兵源，則不敷用；3.閣議奏准攻熱之案，明定用兵範圍，不越滿洲長城界線，如欲越界用兵，必須另由內閣奏請勅旨，而此勅旨，必不可得。積此三因，用兵既無可能，用間乃成上策，亦自然之勢也。

策動華北內變之謀略案，與長城灤東之作戰計劃，同受參謀本部之核定。且於二月廿三日同付實施，故可謂爲本期日本對華侵略一刀兩刃之陰面。作戰計劃之執行人，爲武藤信義（關東軍司令官），而策動內變案之執行人，則爲坂垣征四郎，坂垣時充奉天特務機關長，因執行此陰謀任務，特授密命，來津組織天津特務機關，直接受參謀本部之指揮，此有參謀本部訓令第廿五號可據（「日本現代史資料」⁽⁷⁾，頁五五三）。因有策動內變之案，始有長城灤東之戰役；因見策動內變之失敗，始促塘沽協定之訂立。此中閻苟，複雜緊密，凡欲透悉本段史實者，皆須先握此點。今從長城作戰敍起。

長城各口戰役，始於冷口之爭奪（三月五日起），終於新開嶺陣地之轉移（五月十二）。灤東戰役，則分兩段：第一段自右河寨戰事開始（四月一日），至日軍自動退出灤東止（四月廿二）；第二段自日軍再戰灤東起（五